

在物价上涨后面：更大的民生问题

◎主持人：邹民生 乐嘉春

当前物价上涨难以演变成严重通胀，但物价背后的民生问题耐人寻味

主持人：乐嘉，你好。前两天在电话里听你谈起对房价、肉价、粮油价等价格上涨的看法，角度很特别。你说，当前物价上涨演变成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真正要关注的是物价背后的民生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方桂喜：8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月份的数据，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5.6%，其中城市价格上涨5.3%，农村价格上涨6.3%。从绝对数来看，这些价格变化无疑值得关注。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物价长期保持低增长的国家来说，消费物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恢复性上涨。从决策层来看，多年来都希望农民能够通过价格上涨得到一定的实惠，目前的涨价对农民是有利的。因此，这次消费品涨价，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市场对原有产品比价不合理做出的合理的反应。

从宏观基本面讲，我认为，反而通货紧缩的压力也不小。现在，许多人拿流动性过剩来说通货膨胀问题，其实未必准确。通货膨胀虽然是由过多流动性引起的，但过多流动性却未必会真的出现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要转化为通货膨胀需要许多前提。比如消费者要有很强的购买意愿。在我们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体中，由于整个福利体系的不完善，多数的消费者仍然保持比较保守的消费倾向，投资和消费失衡的总体格局也没有变。如果我们预期会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方针就是自相矛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变动往往是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指针。但是目前我国一些物价稍有波动，就会牵动许多人的心。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稳定物价。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把物价看成是一个民生问题。因此，我们关注物价，最重要的还是关注物价背后的民生问题。

房价其实是一个与民生状况有直接关系的大问题

主持人：怎么理解物价上涨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呢？这个民生问题的关键又在哪里？

方桂喜：说物价也是一个民生问题，而且与收入分配差距有关，那是有原因的。我国目前还是一个转型国家，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一个经济体贫富差距过



■嘉宾

方桂喜：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大，在经济政策的评价上，就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比如对房价问题，富人希望借此增值保值，在目前情况下，对他们来说，购买房产是实现财富增值的好办法；而并不富裕的人买房，只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房价上涨对他们来说是直接的资金压力、还贷压力、生活压力，而财富增值只是说说而已。作为开发商，赚钱是最实际的，谁出多少钱就为谁盖房，因为企业不追逐利润就不是企业了。

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体中，对房价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富人主导的房价市场，在无意识之中就会非常自然地伤害穷人的居住权。为什么呢？因为土地供应量不是无限的，你建设豪宅用的地多，别人建房子自然就用地少，而且富人炒房价的行为又很狠狠地抬高了整个房地产的价格。

所以，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即便是大家在本意上想和谐相处。但反映到经济领域，难免处处存在立场和意见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要取得更多的自由，就必须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这样一个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当然，这还仅仅是从经济领域来看，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大家的观点很难一致。富人说，我们遵循的是市场规则；穷人说，我们遵循的是生存规则。从社会领域看，由贫富差距过大，还会造成心理落差和非理性行为，最终富人难以独善其身。所以，房价问题，其实也与民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物价问题不那么简单，而宏观调控操作不仅难度大，也很难治本

主持人：照你的看法，对物价

的态度，富裕程度不同的人看法不同。如此状况，宏观政策操作又该怎么做呢？

方桂喜：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由收入分配差距引发的民生问题，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物价也不例外。在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福利制度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操作面临许多困难。

第一，既怕通缩又怕通胀，通缩了怕失业过多，是民生问题，通胀了怕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汇率改革就是有这样担忧，我们有一个多亿人在对外开放相关部门工作。升值了怕这些人失业，不升值流动性过剩难以解决，这样，又怕出现通货膨胀。

第二，在政策实施中考虑短期问题太多，不得不小心谨慎，为了民生问题不得不过多地动用行政手段，而这往往不会给市场的反应留出时间。由于缺乏解决民生的制度性的安排，政府不得不随时关注市场出现不利的苗头。

第三，会形成一种凡事不信任市场的习惯。比如，一些物价在供求关系自发调节引起上涨时，政府为照顾困难群体不得不开出行政限价，往往会造成更多厂商的退出，从而加剧短缺。

第四，会形成一个事无巨细的大政府。政府总有管不完的事情。事实上，比如猪肉涨价，这是一个市场化的部门，政府可以只做两件事情，一是管最低生活保障，发挥兜底的作用。二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涨价后，自然会有更多的厂商进入，价格还会自动降下来。这样比管住许多具体的价格简单得多。

也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要想使市场经济成为多数人玩得起的游戏，就必须紧紧建立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并以此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没有这一手做后盾，宏观经济总有难以调和的矛盾。

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正途，但要优先重构福利制度

主持人：你提到了福利制度，这对改善民生与经济有什么影响呢？

方桂喜：目前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推进之所以很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民生问题。比如，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就要求资源要素市场化，但推进这些领域的价格改革，就会使这些领域的价格上涨，从而会担心物价的全面上涨。如果我们有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的话，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政策选择的空间。

因此，在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个很

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立再分配体系，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在特定背景下，这一任务，甚至要优先于市场化改革。

为什么现在许多人不同意市场化改革？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情况下，房地产涨价是再分配，有钱买房子的人立刻就会比没有钱买房子的人收入增加许多，尽管二者的能力可能相差差不多，股市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市场力量自动发挥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个福利制度，如何能够实现社会和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和福利制度之间，在一定时期，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由于福利制度的存在，更多的社会成员能够承担起市场经济运行的风险，他们才可能通过社会共识选择更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再分配制度，没有一个福利制度，更多的社会成员则会对市场经济失去希望，并希望通过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取代市场的行为。

有专家主张，也许现在很大的问题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更多地应当从初次分配入手。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一些垄断行业取得的暴利往往落入了个人手中。但是，这是历史造成的，并非是一些行业个人的贪婪所造成的。我们的改革毕竟不是革命，渐进式的改革毕竟不能不考虑既得利益，涉及个人的具体利益。

但政府则不同，如果有了合法的过高收入，就应当用之于民，就应当在再分配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政府从财政税收渠道获得合法收入，实施再分配，与任何个人和机构从富人手中拿钱不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因此，完善福利制度在当前，其意义也是非常的。

我国正处于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最佳时期

主持人：现在提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时机合适吗？

方桂喜：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从计划经济时代演变而来。在整个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旧的社会福利制度逐步解体，但新的福利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包括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不仅都没有达到全民覆盖，还在城乡、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存在过大的差距。

如果我们仅仅把眼光盯在一般消费品上涨价这一点的话，就会忽略上学、看病这些老百姓支出的大头，在这些领域，困难群体的负担要更重一些。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很好的提法，这意味着政府已经开始把重建福利制度作为政策的重点。这样做，不仅符合多数人的意愿，也是当前开始力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国家财政收入从1950年62亿元开始，到突破1000亿元大关，用了28年时间（1978年为1132亿元）；从1000亿元到1万亿元，用了21年时间（1999年为11444亿元）；而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只用了4年时间；从2万亿元到3万亿元，只用了2年时间；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接近4万亿元，2007年1~6月，全国财政收入26117.84亿元，同比增长30.6%。

应当说，原来许多在改革初期做不到的事情，目前可以加快步伐解决。

这里特别一提的是公共服务问题。什么是公共服务？在我看来，就是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的社会服务，不管你有没有钱，钱多还是钱少，政府都应当为你提供的服务，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公共服务就是现代社会政府最重要的再分配手段。政府运用自身的权力和财政资源，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到与生存发展相关的基本福利。

一段时期以来，许多人在批评公共服务市场化。公共服务市场化事实上在我国被误解了，被认为是政府推卸责任，把付费转嫁给了个人。其实，真正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政府承担最终责任，而把某些具体任务委托给私人部门或者民间组织做而已，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因此，我国目前还应当由政府承担最终责任的情况下，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所谓基本公共服务，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核心公共服务，这些公共服务是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基本公共服务应当均等化，我们应当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差距是正常的，但是不同社会成员在基本权利和机会上的不平等就是问题了。尤其是，通过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可以缩小这些社会成员之间实际的收入差距。

因此，国家应当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制订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通过有约束性的社会发展规划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基本公共服务能够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当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对健全，公共服务基本完备之后，我们再来看物价问题，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看点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物价长期保持低增长的国家来说，消费物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恢复性上涨。这次消费品涨价，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市场对原有产品比价不合理做出的合理的反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变动往往是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指针。目前我国一些物价稍有波动，就会牵动许多人的心。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稳定物价。

●我们关注物价，最重要的还是关注物价背后的民生问题，而且这与收入分配差距有关。我国目前还是一个转型国家，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是一个事实。从社会领域看，由贫富差距过大，还会造成心理落差和非理性行为，最终富人难以独善其身。

●由收入分配差距引发的民生问题，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物价也不例外。在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福利制度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操作面临许多困难。在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要想使市场经济成为多数人玩得起的游戏，就必须紧紧建立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并以此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没有这一手做后盾，宏观经济总有难以调和的矛盾。

●在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立再分配体系，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在特定背景下，这一任务，甚至要优先于市场化改革。

●国家应当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制订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通过有约束性的社会发展规划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基本公共服务能够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当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对健全，公共服务基本完备之后，我们再来看物价问题，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编余

去年以来，先是部分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后是部分日用消费品价格上涨，特别是最近几个月的菜价上涨、肉价上涨，让普通老百姓直感生活成本增加、压力上升。而房价腾升、股价猛涨，似乎和手头并不宽裕的老百姓隔一层，没多大关系。其实，并非如此。

这一轮资产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上涨，意义并不简单。它预示着由收入差距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的社会各阶层和利益主体之间，又将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的财富重新分配。肉价也好，房价也罢，都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与老百姓的生存状况休戚相关，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生问题。这便是方桂喜博士的见解。

既然是民生问题，就难免要谈到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等问题。根据方博士的研究，如果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对健全、公共服务基本完备，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所谓物价问题，就不会这么复杂，与很多民生问题纠缠在一起，因而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有鉴于此，政府对物价问题，一方面要从民生的角度予以高度重视，不能完全任由不健全的市场之手来摆弄；另一方面在调控物价时，还要与重构福利制度同时进行。这样才能将与民生问题纠缠不休的物价波动看得更透，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方博士所言是谈物价的人很少切入的，可资思考。

——亚夫

调控物价与重构福利制度并举

◎方桂喜

在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健全的大背景下，无论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房价上涨问题，还是目前的猪肉、粮油价格上涨问题，都直接表现为严重的民生问题。我们有太多的低收入者，如果这些价格太高，许多人就会马上陷入困境。这是各级政府不得不大力干预市场价格价格的直接原因。

但这样做往往会陷入一个悖论。就是我们一直倡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又惧怕价格的波动。

就目前部分食品的涨价而言，很难演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在目前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多数老百姓仍不敢多花钱，内需不足仍将是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对于富人来说，增加的钱很难会花在猪肉这样的消费品上。也就是说，这些局部的价格上涨主要是由局部生产领域供给所引起的。如果政府直接控制这些领域的价格，这些局部领域的供给能力就很难恢复。从长期看，只会增加这些领域的短缺，从而加剧本已严重的供求矛盾，难以达到预期的政

策效果。最好的办法是政府要兜底，增加最低生活保障开支，确保穷人能够生活。让市场自动解决供求不平衡的问题。

真实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大家就难以承担市场经济运行的风险，大家玩不起市场经济的“游戏”。价格降一点怕通缩，要刺激消费；价格升一点怕通胀，需要抑制消费。通缩了不好，是因为将使许多人失业，通胀了不好，将降低许多人的生活水平。

没有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宏观调控往往会成为一种高难度又令人费解的操作。经济领域出现一点问题的苗头往往就会牵动到最高层，各级政府纷纷出手来应对。主要原因在于民生问题缺乏一个制度化的解决途径，在民生问题面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然要靠后站了。

有人说，中国的穷人太多，富人太少，所以不具备条件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事实上恰恰相反，如果富人变多了，多数人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了，福利制度的意义就不大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大幅度削减福利的一个特定背景是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的多数。按照国内一

些学者的逻辑，他们比过去更有能力承担社会福利。为什么他们在相对比较弱的时候开始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关键问题是那时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更大，能力不足也要建。一个国家只有保持了安定和谐，才能谋取更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富人多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从长期看很难说是丧失了效率。

建立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不仅是为了穷人，也是为了富人。就以房价上涨这个事情看，穷人和富人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差异。富人希望多建好房子、大房子。其实他们的本意并非故意让穷人住不起房子，多数是为了资产的保值增值。穷人希望开发商多建造适用房，希望自己能够买得起房子。对开发商来说，有什么需求就盖什么样的房子。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但在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下，都成了问题。这里隐含的一个逻辑是，满足了穷人的基本保障之后，富人才能够有更大的自由选择权。作为政府，要想更多地尊重市场行为，取决于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

没有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会很困难。比如解决资

源环境问题迫切需要推进要素市场化，需要征收资源税等。这些领域改革的结果多数会造成涨价，而涨价又是我们目前所难以承受的。换句话说，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开始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前提。目前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这一点上。

看到猪肉价格上涨一些就感到问题很严重，怕的是普通消费品成为压垮穷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一般老百姓来说，看病、上学这些负担比这些一般的生活用品高了不知道多少倍。现在还能因这些小事，而忘了更为重要的事情。

作为宏观调控，也不可能看得更为长远。宏观调控犹如司机开车，最重要的是看好眼前的路，保证眼前不出问题。但在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既缺乏一个有效的市场制度，又缺乏一个福利制度。尤其是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福利制度显得更为重要，甚至是通向完善市场制度的先决条件。

没有一个福利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种种做法都很难取得推行改革所必要的社会共识。经济学是理性

的象征，经济学家都希望能够找到最有效率的制度来增加社会福利，从理论上讲，市场制度是最为理想的制度。但也要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制度更体现为一种社会共识。以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显然不是批判福利制度有养懒汉等缺点的时候，而是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它。

伴随着经济转轨的实际进程，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也正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和重构。尤其是目前，我国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全社会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已构成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巨大压力。在近年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建立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福利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如果能够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许多政策选择的空间都会增大不少。尤其是十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下一步，要把城乡、区域、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政府实施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有效地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现状。